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及其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基于一项观察研究

琚晓燕¹, 谢庆红², 曹洪健², 方晓义², 刘宣文³

(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北京 100089;2.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3.浙江传媒学院,杭州 310018)

【摘要】 目的:探索夫妻互动特点以及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相对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的研究范式,对 41 对新婚夫妇进行观察研究,采用爱荷华家庭互动编码体系(IFIRS)对其行为进行编码。结果:①在问题解决时,妻子的行为比丈夫更消极;丈夫比妻子更积极。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的行为比丈夫更消极,积极行为没有差异。②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比妻子消极的组,妻子的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妻子比丈夫消极的组。③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的积极行为多于丈夫的组,比起那些丈夫的积极行为多于妻子的组,丈夫的婚姻质量更高。结论:在问题解决时,丈夫的消极行为比妻子的消极行为对妻子的婚姻质量更具破坏力;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的积极比起丈夫的积极,对丈夫的婚姻质量更具正向影响力;丈夫冲突情境下的积极行为比社会支持情境中的积极行为对婚姻质量更有正向作用。

【关键词】 夫妻差异;问题解决;社会支持;观察研究;婚姻质量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5-0790-05

H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teraction Behaviors Influence Their Marriage Quality: An Observational Study

JU Xiao-yan, XIE Qing-hong, CAO Hong-jian, FANG Xiao-yi, LIU Xuan-wen

School of Social Work,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interaction behaviors in couples and how these differences influence their marital relations. **Methods:** Using the problem-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paradigm, 41 couples have been videoed. IFIRS was used to code their behavior. **Results:** ①Wives were more negative than husbands in both problem solving and social support context, and less positive onl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②Wives were less satisfied with their marriage in the group which husbands displayed more negative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e group in which wives displayed more negative behaviors than husbands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③Husbands were more satisfied in the group which wives displayed more positive behaviors, compared to the group in which husbands displayed more positive behaviors than wives. **Conclusion:** Husbands' negative behavior were more destructive to wives' marital satisfaction comparing to wives' negativit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Furthermore, wives' positivity in social support context have more positive effect on husbands' marital satisfaction comparing to husbands' positivity. Husbands' positivity in problem solving context were more predictive to relationship quality than that in social support context.

【Key words】 Couple difference; Problem solving; Social support; Observational study; Marriage quality

在世界范围内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吸引着许多学者对婚姻研究的兴趣。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易感-压力-适应”理论认为,夫妻之间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 Behavior)是影响婚姻结果的最近路径^[1],是婚姻成与败的最后一道防线。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就开始对夫妻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观察研究,得出大量有意义的成果。如,夫妻在问题解决中的消极行为(敌意、愤怒、轻视等)能够负向预测婚姻质量^[2]。Gottman 的研究指出,夫妻互动中的批评、防御、轻视、冷若冰霜(Stone-wallling)最能预测婚姻结

果,被称为婚姻的“四大预警”行为^[3]。后来,针对夫妻互动中的序列行为进行编码后发现,妻子以苛刻、指责的方式开启谈话,丈夫使得妻子低强度的消极行为升级、丈夫拒绝妻子的影响等互动行为能够预测离婚^[4]。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在其他的 research 中得到重复验证^[5]。关于夫妻互动中的积极行为(温暖支持、肢体情感、倾听反应等)还是消极行为(如敌意升级、指责、蔑视等)对婚姻结果的影响力更强,研究也未得出一致结论。

造成以上研究结果不稳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研究忽略了丈夫和妻子互动行为的相对差异对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关于冲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支持计划的资助

通讯作者:方晓义, E-mail: fangxy@bnu.edu.cn

突话题的讨论大多由妻子发起^[6],妻子的行为总体上要比丈夫更消极(如更多的批评、指责、敌意等)。也就是说,妻子比丈夫有更多消极行为是一个婚姻的常态;而对于那些丈夫比妻子更消极的夫妻来说,他们的婚姻质量又如何呢?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夫妻,他们一方互动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强弱可能受到另一方互动行为水平高低的影响。例如:两个妻子的消极行为得分相同,其中一个妻子有一个比她温和的丈夫,而另一个妻子有一个比她更苛刻的丈夫,那么两个妻子的消极行为与婚姻质量关系的强度可能是不一致的,丈夫的行为可能具有调节或增强作用。有研究指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夫妻行为的客体效应(partner effect)比个体主义文化下的夫妻更明显^[7];也就是说,夫妻一方的行为反应容易对方产生影响。以往研究中只考察其中一方行为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容易掩盖另一方行为的调节效应。我们需要考察双方互动行为的相对差异量对婚姻结果的辨别力。在本研究中,以夫妻双方行为的差异量为基础,对夫妻进行分类,检验不同类型夫妻婚姻质量的差异。

另外,文化因素对人的行为塑造不容忽视^[7]。在行为表达上,西方文化背景下,比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倾向于最大化他们的积极情绪经验和表达,尽量最小化他们的消极情绪经验和表达^[8]。目前夫妻观察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夫妻是如何互动的?呈现出怎样的夫妻差异?本研究采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两种经典的观察情境,对丈夫和妻子的冲突解决和相互支持行为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揭示中国夫妻的行为互动特点。本研究在每个情境中都邀请丈夫和妻子每人选择一个话题讨论,以探索不同话题提出人对互动行为的影响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被试为结婚一年以内的新婚夫妻,双方均初婚且没有小孩。通过某大学实验室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招募。所有被试都在参与研究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共获得有效被试 41 对,夫妻来自七个省市,其中浙江 19 对、安徽 3 对、江苏 2 对、河南 11 对、山西 2 对、北京 3 对、黑龙江 1 对。夫妻的平均婚龄为 6.8(SD=4.8)个月,丈夫的平均年龄为 27.2 岁(SD=2.5),妻子的平均年龄为 26.0 岁(SD=2.0);丈夫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5.1

(SD=2.1)年,妻子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4.8(SD=2.2)年;丈夫的月平均收入为 3417.9(SD=1876.9)元,妻子的月平均收入 2236.6(SD=1288.0)元。

1.2 研究程序

观察研究中所使用的任务参考 Gottman^[9]、Pasch 和 Bradbury^[10]的实施程序。接受过培训的主试到被试家中完成实验。先签署知情同意书,强调保密原则。实验过程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填写,夫妻独立完成;第二部分为半结构化互动任务,包括“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谈话过程被录制。实验先进行问题解决任务,再进行社会支持任务,以避免被试带着消极情绪结束。在每个任务中,夫妻各自选择一个话题讨论 10 分钟,顺序随机。在“问题解决”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认为婚姻中需要解决的冲突讨论,尽量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在“社会支持”任务中,要求夫妻双方各选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对自己不满意想要改变和提升的方面来讨论,且这个方面没有引发过夫妻冲突。要求夫妻以平常的方式对对方进行回应。整个研究完成后,夫妻获得价值 30 元的礼品作为回馈。

1.3 工具

1.3.1 互动行为的编码 编码者采用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11]中的 15 种行为对夫妻的录像进行编码。编码人员在美国某大学参加了累计 100 小时的培训,通过相关测试,并隔周参加两小时的编码一致性培训,以减少编码偏差。编码时,采用 Noldus Observer XT 软件对每个互动任务观看二到三次并进行记录,最后综合行为出现的频率和强度,给丈夫和妻子的各行为从 1“从未出现”到 9“非常频繁、高强度的出现”进行评分。15 种行为聚为两个因素: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12]。积极行为得分是互动者在讨论过程的愉悦度、积极心态、温暖/支持、身体上的亲密、幽默/玩笑、赞美以及倾听反应方面的得分取平均值。为评估一致性信度,由另外一名编码者对 40%的录像(16 份)进行重复编码,以检验编码的可靠性^[13]。对于不同编码者评分一致性的评估,一般采用 ICC 作为指标(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14]。积极行为的 ICC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问题解决互动中,丈夫为 0.72,妻子为 0.90;在社会支持互动中,丈夫为 0.79,妻子为 0.86。消极行为得分是互动者在愤怒威胁、轻视、否认、阻止谈话进程、控制、敌意、质问以及言语攻击方面的得分取平均值。消极行为的评分者一致性信度 ICC 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在问题解决互动中,丈夫为 0.75,妻子为 0.79;社

会支持互动中丈夫为 0.74,妻子为 0.62。

1.3.2 婚姻质量 采用 Norton^[15]的婚姻质量问卷 (Quality Marriage Index, QMI)。共包含 6 道题目,前五题采用 7 点计分,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第六题为 10 点计分,要求评价婚姻的总体幸福度。总分越高代表婚姻质量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妻子为 0.89,丈夫为 0.83。

1.4 数据整理和分析

采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录入与管理,分析方法有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配对 t 检验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见表 1),丈夫和妻子在同一个互动中的同一种性质的行为(积极或消极)相关系数都很高(0.59~0.83 之间),说明夫妻双方的行为

是相互影响的。而丈夫(或妻子)在同一个互动中积极和消极行为之间只有低等程度的相关(0.21~0.35 之间),说明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之间相对独立。

2.2 夫妻互动行为差异分析

2.2.1 问题解决行为的差异分析 由图 1 可见,无论是在丈夫挑选的话题($t(40)=-2.65, P<0.05; t(40)=-4.02, P<0.001$)还是妻子挑选话题($t(40)=2.06, P<0.05; t(40)=-3.43, P<0.001$)的讨论中,丈夫的积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妻子,而妻子的消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丈夫。综合问题解决任务中这两次的话题讨论过程来看,总体上,丈夫有更高的积极行为得分, $t(40)=2.86, P<0.01$;而妻子有更高的消极行为得分 $t(40)=-4.06, P<0.001$ 。进一步将同一角色的同一行为在不同话题提出人的互动中比较发现,丈夫和妻子的积极和消极行为,在不同的话题提出人互动中均无显著差异。

表 1 夫妻婚姻质量与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行为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H 婚姻质量	37.20	2.95									
2 W 婚姻质量	36.15	5.43	0.39*								
3 H-PS-Pos	2.67	0.75	0.29	0.35*							
4 H-PS-Neg	2.14	0.67	-0.16	-0.16	-0.29						
5 W-PS-Pos	2.48	0.64	0.29	0.35*	0.83***	-0.35*					
6 W-PS-Neg	2.61	0.89	-0.26	-0.11	-0.27	0.59***	-0.48***				
7 H-SS-Pos	2.64	0.80	-0.15	0.26	0.59***	-0.19	0.41**	0.03			
8 H-SS-Neg	1.64	0.56	-0.36*	-0.22	-0.48***	0.61***	-0.49***	0.49***	-0.21		
9 W-SS-Pos	2.59	0.69	0.01	0.28	0.59***	-0.32*	0.63***	-0.31*	0.80***	-0.28	
10 W-SS-Neg	1.98	0.62	-0.33*	-0.10	-0.41**	0.61***	-0.51***	0.65***	-0.09	0.82***	-0.28

注: * $P<0.05$, ** $P<0.01$, *** $P<0.001$; H 代表丈夫, W 代表妻子, Pos 代表积极行为, Neg 代表消极行为; PS 代表问题解决任务, SS 代表社会支持任务,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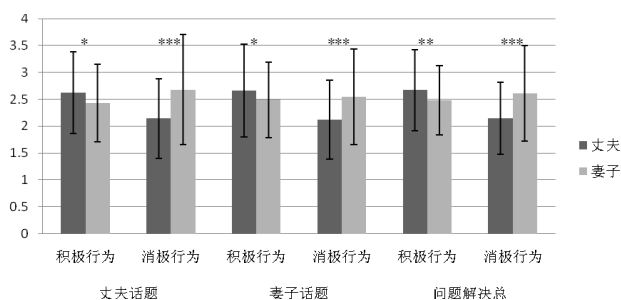


图 1 问题解决任务丈夫和妻子行为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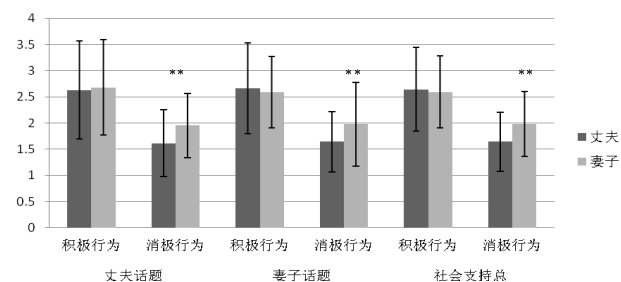


图 2 社会支持任务丈夫和妻子行为比较

2.2.2 社会支持行为的差异分析 由图 2 可见,妻子的消极行为得分,无论是在丈夫挑选的($t(40)=-4.17, P<0.001$)还是妻子挑选的($t(40)=-5.11, P<0.001$)社会支持话题讨论中,都要显著高于丈夫。综合社会支持任务中这两次的话题讨论过程来看,总体上,妻子有更高的消极行为得分 $t(40)=-6.20, P<0.001$ 。进一步将同一角色的同一行为在不同话题提出人的互动中比较发现,丈夫和妻子的积极和消极行为,在不同的话题提出人互动中均无显著差异。

2.3 夫妻之间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夫妻之间互动行为差异的不同水平是否会使得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有差异,我们根据同一情境下丈夫和妻子分别在积极和消极行为上的得分,把被试各分为两组:妻子得分高于丈夫组和丈夫得分高于妻子组。由于样本量较小,采用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来比较两组被试在丈夫和妻子分别报告的婚姻质量上的差异(分组后被试数大于 5 对的小组

保留并参与计算)。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消极大于妻子的组比妻子消极大于丈夫组,妻子的满意度更低;在社会支持时,妻子积极大于丈夫组比丈夫积极大于妻子组,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更高,其他组没有显著差异。显示了一方行为对另一方主观婚姻质量产生的客体效应。也就是说,在问题解决时,妻子的消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丈夫比妻子更消极;在社会支持情境下,丈夫的积极并不会使得丈夫更满意,只有妻子比丈夫更积极一些时,丈夫的满意度更高一些。

2.4 不同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同一角色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差异

对夫妻婚姻质量的影响,我们根据丈夫或妻子在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情境中的行为得分,把被试分别分为两组:问题解决得分高于社会支持得分组和社会支持得分高于问题解决组,采用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对两组在夫妻报告的婚姻质量得分上的差异进行检验(分组后被试数大于 5 对的小组保留并参与计算)。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如果丈夫在问题解决情境中比在社会支持情境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行为,丈夫的婚姻质量得分更高一些。也就是说,丈夫如果能够在冲突的情境下,多一些幽默、轻松、温暖支持,有效化解冲突,比起他在社会支持情境中的这些积极行为,更会对自己的婚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表 2 同一情境下夫妻之间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分析(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

情境	组别	丈夫婚姻质量			妻子婚姻质量		
		<i>n</i>	MEAN RANK	<i>Z</i>	<i>n</i>	MEAN RANK	<i>Z</i>
问题解决	妻子积极大于丈夫组	11	20.41	-0.735	11	20.14	-0.633
	丈夫积极大于妻子组	25	17.66		25	17.78	
	妻子消极大于丈夫组	30	20.32	-0.895	30	21.43	-2.111*
	丈夫消极大于妻子组	8	16.44		8	12.25	
社会支持	妻子积极大于丈夫组	18	22.86	-2.157*	18	21.22	-1.240
	丈夫积极大于妻子组	19	15.34		19	16.89	

表 3 不同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对婚姻质量影响分析(非参数独立样本检验)

角色	组别	丈夫婚姻质量			妻子婚姻质量		
		<i>n</i>	MEAN RANK	<i>Z</i>	<i>n</i>	MEAN RANK	<i>Z</i>
丈夫积极	问题解决大于社会支持组	17	23.29	-2.263*	17	21.44	-1.286
	社会支持大于问题解决组	20	15.35		20	16.92	
妻子积极	问题解决大于社会支持组	13	22.54	-1.240	13	20.73	-0.501
	社会支持大于问题解决组	25	17.92		25	18.86	
妻子消极	问题解决大于社会支持组	32	19.83	-0.740	32	20.39	-0.121
	社会支持大于问题解决组	8	23.19		8	20.94	

3 讨 论

3.1 夫妻的行为差异

总体来看,妻子在问题解决时更具有攻击性;而丈夫更倾向于通过开玩笑、承认错误或拉拉手、拍一拍对方等肢体行为安慰并避免冲突升级。无论是讨论丈夫的话题,还是妻子的话题,妻子的行为模式并无差异。而且,即使在双方讨论一个自己遇到的困难,需要支持的情境中,妻子也比丈夫更敌意。这和 Christensen 和 Heavy^[16]、Heyman^[2]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他们认为,讨论不同人提出的话题时,丈夫和妻子的行为模式是有差异的。与 Neff 和 Karney^[17]的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在社会支持能力上没有差异的结果也不一致。为什么不论讨论谁的话题,不论是问题解决还是提供支持,妻子都有更多的消极行为

呢?可能的解释有两种:性别差异和冲突角色说。从某种意义上,研究支持了性别差异说。那么,为什么男女会因性别而出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呢?Gottman 和 Levenson^[18]的研究曾发现:丈夫在冲突解决谈话中的消极情感与生理唤醒(如心跳速度、皮肤温度、皮电传导等)指标显著相关,而妻子的相关不显著。他们假设,丈夫为了避免这种消极的生理体验,在谈话中更倾向于回避,减少互动,或者以妥协、让步或和解的方式避免冲突,而妻子却坚持要彻底解决问题,所以有更多的控制、指责、质问等行为。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转型社会性别文化相互冲撞说^[19]。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使得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中慢慢脱离出来,更多的走向职场,但同时她们却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性别角色赋予她们的任务,如照顾家庭,抚养孩子等。调查显示,妻子认同家务分配不公

平的多于丈夫,男性经济自主和个人花费更大^[20],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都显著低于丈夫^[21]。家庭地位不公,还要面对社会和职场上的压力,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不论讨论谁的话题,妻子都有更多的抱怨指责和批评等。

3.2 夫妻之间行为的差异对婚姻质量的影响

在问题解决时,丈夫比妻子消极的组,妻子的婚姻质量显著低于妻子比丈夫消极的组。结合夫妻行为差异的研究结果,可以推论:妻子比丈夫更消极一些,似乎成为夫妻在问题解决时的常态,而如果妻子有一个比她更消极的丈夫,妻子对婚姻的幸福感受会大大降低。这个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验证了Gottman, Cohan, Carrere 和 Swanson^[4]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互换消极行为并不是问题,即使在幸福的夫妻中,他们也会吵架。一般情况下,丈夫会努力使消极行为降级;而一旦丈夫使得消极行为升级,后果就比较严重。在妻子比较生气的时候,他比妻子更生气,这样就会使得冲突不可收拾。我们后来针对不同情境下同一角色的行为差异分析也支持了这个结果:丈夫如果能够在冲突的情境下,多一些幽默、轻松、温暖支持,有效化解冲突,比起他在社会支持情境中的这些积极行为,更会对自己的婚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在社会支持情境中,妻子的积极行为多于丈夫时,比起那些丈夫的积极行为多于妻子的组,丈夫对婚姻的感受会更好。换句话说,丈夫在社会支持中的积极行为多并不会使得他们对婚姻更满意,而只有妻子的积极行为,特别是在丈夫遇到困难并向妻子表露出自己的脆弱和无助时,妻子能够以温暖、支持、倾听的方式回应丈夫,丈夫的满意度才会更好一些。这一结果也支持了Pasch 和 Bradbury^[10]的研究结果,他们通过对问题解决和社会支持情境的比较发现,妻子的社会支持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度和结果的重要变量。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受到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束缚,男性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是一个易感情境,一旦妻子没有恰当的表达出对对方的关心支持,丈夫的满意度就会大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他下次在相同情境下的表达。

在问题解决时能表现出更多积极行为的丈夫,比那些在社会支持时有更多积极行为的丈夫的婚姻质量更高。也就是说,丈夫在问题解决中的积极行为更与自己的婚姻质量相关。这似乎证明同一性质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婚姻质量的意义是不同的。然而,却与Melby^[22]的研究结果有些矛盾。他们认为,

积极情境下的积极行为对婚姻质量的预测力比问题解决情境下的更强。未来研究可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验证和解释。

参 考 文 献

- 1 Karney BR, Bradbury TN.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8(1): 3-34
- 2 Heyman RE. Observation of couple conflicts: Clinical assessment applications, stubborn truths, and shaky foundation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1, 13(1): 5-35
- 3 Gottman JM. What predicts div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process and marital outcomes. Mahwah, NJ: Erlbaum, 1994
- 4 Gottman JM, Coan J, Carrere S, et al. Predicting marital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from newlywed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8, 60(1): 5-22
- 5 Kim HK, Capaldi DM, Lynn C. Generalizability of gottman and colleagues' affective process models of couples' relationship outcom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7, 69(1): 55-72
- 6 Ball ELJ, Cowan P, Cowan CP. Who's got the power?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ner's perception of influence during marital problem-solving discussions. *Family Process*, 1995, 34: 303-321
- 7 Schoebi D, Wang Z, Ababkov V, et al. Affective interdependence in married couples' daily lives: Are ther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artner effects of anger? *Family Science*, 2010, 1(2): 83-92
- 8 Kitayama S, Markus HR.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ympathy: Cultural patterns of self, social relations, and well-being. In Diener E, Suh EM. *Cultur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113-161
- 9 Gottman JM. *Marital interactio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10 Pasch LA, Bradbury TN. Social support, confli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al dysfunc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8, 66(2): 219-230
- 11 Melby J, Conger R, Book R, et al. 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5th ed). Unpublished Document, Iowa State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1998
- 12 Williamson HC, Bradbury TN, Trail TE, et al. Factor analysis of the Iowa family interaction rating sca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25(6), 993-999
- 13 Gottman JM, Notarius CI. Decade review: Observing marit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0, 62(4): 927-947

负,且对他人的欺负感到无奈。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到了初四年级,受关系欺负的比例明显下降,这可能与学习时间紧迫、升学压力较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有直接关系。同时,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初四年级学生,随着体力和能力的发展,以及伴随着几年的同学关系磨合,会使其曾经受欺负的地位得以改变。

相关分析显示,亲子依恋与同伴关系呈正相关,二者与受欺负呈负相关。亲子依恋程度能够显著预测初中生的同伴关系和受欺负状况。依恋程度愈强,同伴关系愈好,受欺负愈少,反之亦然。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与同伴友好相处,即可能更少受到欺负。

本研究显示,初中生同伴关系在亲子依恋与受欺负两个变量之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是两者的中介变量。由此可以认为,初中生亲子依恋是通过同伴关系对受欺负状况产生影响的。因此,对初中生受欺负状况的干预,可以通过对亲子依恋和同伴关系的调解和改善来实现。

参 考 文 献

- 姜英杰,李广,邵涵玉. 欺负行为测量:问题及解决. 心理科学,2007,30(3):654-656
- 周华珍,何子丹. 关于国外校园欺负行为的干预经验研究及其启示. 中国青年研究,2009,8:5-8
- Sheri B, Adrienne DR. Preservice teacher's responses to bullying Scenarios: Comparing physical, verbal and relational bully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6, 98(1): 219-231
- 朱丽,雷雳. 中学生受欺负状况与心理控制感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5,1:91-95
- 王美芳,张文新. 中小学中欺负者、受欺负者与欺负-受欺负者的同伴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2,18(2):1-5
- 刘小群,杨新华,周丽华,王立军,苏林雁. 小学高年级儿童亲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2):246-248
- Hunter SC, Boyle JME, Warden D. Perceptions and correlates of peer-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77: 797-810
- Kelly C, Eric V. Nonbullying victims of bullies: aggression, social skills, and friendship characteristics.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24: 535-551
- 王丽萍. 中学生受欺负与其社会行为、同伴关系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殊教育,2011,11:88-91
- 雷雳,张雷. 初中生受欺负状况的某些预测变量. 心理学探新,2002,22(4):38-43
- 张文新. 中小学生对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 心理学报,2002,34(4):387-394
- 尚秀华. 青少年依恋、自我概念与学业成就的关系.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 陈福侠,张福娟. 工读学校学生同伴依恋、自我概念与孤独感的特点及其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1):73-80
- 张敏. 儿童欺负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个性特征和人际关系因素的关系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
- Hunter SC, Boyle JME, Warden D. Perceptions and correlates of peer-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77: 797-810
- 郑希付. 中学欺辱现象研究. 心理科学,2000,23(1):73-77
- 高秋凤,李晓东. 中小学生对欺负行为的理解.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1):93-95
- 陈世平. 中小学欺负行为调查. 社会心理研究,2001,1:24-28
- (收稿日期:2013-04-24)
- later dissolution: Behavior, physiology, and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2): 221-233
- 徐安琪.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社会学研究,2005,4:134-152
- 徐安琪. 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 见:孟宪范.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徐安琪. 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 浙江学刊,2004,2:
- Melby JN, Ge X, Conger RD,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task in evaluating positive marit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5, 57(4): 981-994
- (收稿日期:2013-03-06)

(上接第 794 页)

- McGraw KO, Wong SP. Forming inferences about som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Psychological Methods, 1996, 1(1): 30-46
- Norton R. Measuring marital quality: A critical look at the dependent variab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83, 45(1): 141-151
- Christensen A, Heavey CL. Interventions for coupl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9, 50(1): 165-190
- Neff LA, Karney BR.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support: A question of skill or responsiv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1): 79-90
- Gottman JM, Levenson RW. Marital processes predictive of